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认同政治：一个案例分析

刘永涛

(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博士, 200433)

【摘要】 认同政治是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 本文选择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作为案例, 分析和考察认同政治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揭示这一政策失败背后美国方面所存在着的认知问题。

【关键词】 认同政治 新中国 美国 对华政策

作为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 “认同”正在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研究中日益重要的概念。然而, 仅仅认识到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尚不够, 人们还需要从经验分析上对认同和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给予更多的说明。社会建构主义假定, 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形成不仅受制于外界物质环境的压力, 而且还与决策者的认知行为有关。对这假定进行实证的过程, 也是谋求重建对外政策理论的过程, 因为长期以来国家对外政策理论一直由国际体系物质实力分配论所支配, 忽视和低估了认同政治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试图对认同政治的有关理论进行叙述, 然后, 选择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作为案例, 分析和考察认同政治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揭示这一政策失败背后美国方面所存在着的认知问题。

对认同政治的建构主义理解

长期以来, 对外政策分析一直受物质实力论的影响和指导。新现实主义范式认为, 在国际政治体系中, 国际体系中物质结构特征决定着国家的行为, 并且限制或制约着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对外政策方面, 物质结构决定着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因此, 只要物质结构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那么, 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是相对固定不变的, 或者说在客观上是可预见的。

建构主义则认为, 世界政治体系中存在着两种相互关联的结构: 物质结构和观念结构。国家的行为和利益不仅受到体系中物质结构压力的制约, 而且还受影响于观念结构中主体间社会互动的的作用。在对外政策分析方面, 建构主义强调, 认同政治对国家利益的

形成、政策选择及行为等构成重要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制订过程是确定和区别自我身份和“其它者”身份的过程。

那么什么是认同? 对此, 目前人们尚无确切和统一的定义。一种认为把认同理解为是行为体的身份。另一种认为把认同看作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与某些行为体相似、与另一些行为体相区别的状态。^[1]也有人把认同看作是“行为体的一种属性, 它引起具有动机性的和行为的特质”, 从这个意义上讲, “认同具有主体性特征”。^[2]这种主体间性质帮助构成认同中“自我”和“其它者”之间的区别。从这些定义中, 人们可以看到, 认同乃是一种社会建构, 它不仅存在于社会关系中, 具有身份的含义, 而且构成行为体的基本属性。

认同可大体分为两类: 自我认同和集体认同。它们也被称为认同的内在结构和认同的外在结构。

行为体的认同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理解。

首先, 社会和历史过程是建构认同的重要力量。每个行为体具有一种自我概念。它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 譬如, 有关国家或民族的观念是近代历史的产物, 国家身份是在人类广阔的历史的背景下体现在局部层面上的政治及心理结果。认同或身份的形成具有社会性, 它述并规定着行为体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应该如何思考、感觉、评价以及行动。^[3]这一过程的性质决定着自身如何确定自己的范围。一定的社会环境决定着行为体的一定身份。认同或身份乃是一种社会建构。这可以进一步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第二, 心理过程构成认同建构的另一个力量。认同也是一种心智再现。从个体上讲, 行为体的心智活

动使行为个体战胜内在自我的缺陷,对大量的外界刺激进行有组织地安排,并以自我图式作为工具,对自我以及外界环境进行理性的管理和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认同建构过程是一种心理机制适应和调节的过程,它不仅给行为体提供一种自我感知和内在心智活动的机会,而且为理解自我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手段。

从群体方面看,认同或身份由独立的范畴或特定的群体成员所组成。在一个国家里,大多数的人们之间并不相识,甚至一辈子也不会相见,但是,他(她)们具有共同的认同或身份,因为他(她)们分享着这个国家的基本特质(包括政治信仰、宗教、民族、意识形态、语言、文化等)。这是国家民族心理过程的力量,它帮助想象出一个民族共同体。

第三,话语构成认同建构的工具。如果说身份建构的过程是把自我与其它者区别开来的过程,那么,话语则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行为体通过语言叙述……譬如历史叙述……把自我与其它者区别开来。在这里,且以国家行为体为例,国家认同或身份的形成处于一个更为广泛的历史叙述中。叙述本身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一个国家建构它的集体认同。如果说叙述涉及到故事情节,那么,国家在进行自我叙述的过程中会建构一种故事情节,譬如关于国家的起源、能够体现和代表这个国家并为全体国民所集体记忆的历史经历或重大事件等。

这种区别的过程往往容易形成自我与其它者之间的敌对关系,即潜伏着自我与其它者之间的暴力冲突。不过,在建构主义看来,话语建构的过程也可以是在非敌意的形式下进行的,以非敌意的方式建构起来。通过话语,行为体的认同或身份得到建构,它可以决定自我与其它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一般地讲,行为体之间关系的性质往往是由强者加以解释和确定的。

第四,个人行为体也可以构成认同建构的力量。个人行为体出于各种目的,可以通过实践活动建构认同或身份。譬如,本国(自我)与别国(其它者)发生暴力时,本国的政治精英们会建构一种敌对的别国身份,并利用国家宪法和它的制度化规范去动用本国资源,加强自身的权力,最终确立自我的身份。

显然,认同或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或静止的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建构。传统的理论认为,认同或身份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产物,是社会世界中不变的事实。一定的认同是由人性而不是由社会习俗和实践所确定的。建构主义则认为,认同或身份不是固定的或理所当然的,而是在社会环境中被建构起来的。由于认同处于变化的过程中,因此,行为体之间在认同或身份上的相互认知可以从消极到积极、从把其它者看作是一种诅咒到把其它者看作是自我的一部分,或是把其它者看作是对自我的一种延伸。当然,积极的相互认

同也可以转变成消极的认同。^[4]

不过,认同的变化也不是无限性的,因为身份还具有非社会的成分,如物质和其它方面的特征,譬如行为体(如国家)的规模、地理位置、种族、语言、历史经历、文化传统等,这些都是难以变化的。在温特那里,这些被认为是集体身份,这种身份影响着“自我”对“其它者”的看法,也影响着“其它者”对“自我”的看法。因此,尽管身份在一定的社会互动过程中会发生变化,但是,身份一般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因为身份是一种先验图式,而先验图式通常是拒绝一般变化的。

建构主义者对认同政治感兴趣,那是因为发现认同与行为体的利益及行为之间存在着构成性关系。

一般地讲,利益是一种渴望,是行为体所需求的东西。根据社会理论,利益有两种:一种是客观利益,另一种是主观利益。客观利益指的是行为体为了生存或延续下去所必须获得的必要满足或是功能上达到必要需求。如果这些满足或需求无法获得,那么,这个行为体就无法生存下去。譬如,国家作为一个实体,具有基本的生存需求特征,如国家需要有领土范围、构成这个国家的民众和政治制度、基本的物质资源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着一般性的“国家利益”,即这种国家利益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形下都是存在着的。主观利益则是指行为体实际所具有的关于如何满足自身需求的信念。它是行为体行动的动力。这种利益类似于传统理论所讲的“偏爱”或“渴望”。

传统的政治理论没有充分地讨论认同与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现实主义认为,利益是客观的、外源的、特定的、有序的和稳定的。一般地讲,所有的国家,在一定的物质环境下,通常具有一种稳定的安全利益。在传统的现实主义那里,国家利益表现为对权力的渴望、扩张和炫耀。在新现实主义那里,国家利益主要表现为安全生存。更为具体的利益主要被看作是独立于社会互动过程之外的。也就是说,在传统的理论看来,社会互动不会改变国家的身份和利益,除非国家之间相对的物质实力在分配上发生变化。这就是传统的理论不愿意积极讨论认同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国家行为体行为受制于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

建构主义则认为,认同决定着利益。利益是行为体所需要、所渴望的东西。利益以认同作为前提。如果某个行为体不知道自己是谁,那么,这个行为体就无法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行为体只有知道了自己的身份之后,才有可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显然,体现在国家身份中的信仰、价值、规范和实践在利益构成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地讲,国家身份中固有的价值确定着国家所追求的目标、满足和实惠。此外,扎根于行为体身份中的信仰,可以帮助行为体在实现自我利益时如何确定和诠释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并

帮助行为体对具体的行为作出一定的选择。

不仅如此，利益反过来重建着认同。由于认同主要还是一种状态或存在，还不等于渴望，因此，如果没有利益，认同就没有了动力，反过来，如果没有认同，利益也就没有了方向。在建构主义者看来，认同加上利益等于行动。身份和利益是相互构成的。

建构主义指出，如果国家行为体之间可以发展成为集体认同的基础之一，是它们分享着“共同的”利益。反过来，如果国家之间缺乏积极的认同，那么，本国利益是在不考虑其它者的情况下确定的。认同过程的性质决定着自身如何确定自己的范围。它是实现政治权威国家化的必要的社会心理条件。不过，国家之间认同关系的性质往往是由强国所支配并加以确定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选择

自“门户开放”政策以来，美国不断谋求实现它在中国的经济、宗教、文化、安全等方面的利益。辛亥革命后，美国一直认为国民党政权是中国的合法代表。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美国面临是否承认中共新政权的问题，本文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造成美国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作出错误的选择，而认同政治则在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对战后的中国有几个主要设想：1)中国不要再发生内战；2)中国在维持和平方面发挥作用；3)中国成为战后苏联可能在亚洲扩张的缓冲力量；4)中国填补日本战败后在亚洲所留下的权力真空。于是，尽管当时国民党政权腐败虚弱，但是，美国仍然使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把中国列入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四大警察”之一，并帮助蒋介石本人提高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譬如，1937年，美国《时代》杂志把蒋介石夫妇作为该杂志的封面人物。从认同政治上看，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核心之一是选择了国民党政权，并对它进行扶植。然而，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失败了，因为蒋介石再次发动了内战，失去民心，贫穷落后的中国再度陷入战乱之中。

杜鲁门继任总统后，一个主要任务是要在欧洲和亚洲赢得战争。他对外交事务了解甚少，对亚洲的知识了解更少。他认为蒋介石“正在中国进行改革”。^[6]在对华政策制订方面，杜鲁门依靠罗斯福时期的中国问题顾问如赫尔利、魏德迈等扶蒋反共者。日本失败后，杜鲁门的在华目标是要阻止苏联力量帮助中国、阻止中国再度发生内战、确保美国在华影响力。在谋求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杜鲁门选择了继续支持蒋介石政策。他命令日本人向国民党政权投降、让美国海军把近50万国民党军队运往北方等。与此同时，美

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大发雷霆，认为美国国务院内部有官员策划亲共的行动。他的作法引起国会的重视。国会一些共和党议员批评杜鲁门的对华政策过于“软弱”，并要求总统公开所有的雅尔塔会议的条约，声称美国在这次会议上不仅出卖了东欧，而且出卖了亚洲。尽管国会没有找到任何实质性的证据去证实赫尔利的指控，但是，这些作法还是煽起一些美国媒体和公众对总统对华政策的不满。为了平息这场批评，杜鲁门不得不请已经告老还乡的马歇尔出山，派他前往中国。马歇尔的使命是对战后的中国内战进行调停、说服中共军队编入国民党军队、帮助建立由国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1946年，杜鲁门首次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公开声明，称国民党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在院外集团等势力的压力下，杜鲁门政府从经济和军事上援助国民党政权。然而，蒋介石还是再次发动了国内战争。1947年1月7日，马歇尔返回美国，宣告在华调停失败。

1947年，美国国会接受杜鲁门主义。它标志着美国对战后共产主义的遏制战略全面开始。为了避免国内一些人批评政府在反共方面采取双重标准，即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反对欧洲的共产主义，忽视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情形，杜鲁门感到自己需要在中国问题上有更多的行动。在政治认同方面，美国政府明确采取扶蒋反共政策。^[7]杜鲁门派遣魏德迈将军使华，调查中国的情况；国会批准3.38亿美元的援华项目，在马歇尔的建议下，国会又补充了1.25亿美元，支持蒋介石装备军事力量。然而，到了1949年初，国民党力量大势已去。1月21日，蒋介石辞去“总统”职务；同日，艾奇逊出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和杜鲁门都认为，美国的任何援助都无法挽救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虚弱。美国支持蒋介石并卷入中国内战的行为应该结束。这是当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中国白皮书”中的主要结论。美国的对华政策显然又失败了。国会共和党人和院外集团强烈指责杜鲁门政府“失去了中国”。与此同时，杜鲁门面临着对华政策中下一个棘手的难题：是否承认1949年成立的、由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

中共与美国的最初接触始于延安时期，并在共同抗击日本人的战斗中结下友情。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率迪克西使团来华，毛泽东亲自会见代表团成员。1945年1月9日，中共领导人通过信件表达愿意访问华盛顿的愿望，寻求美国对中共的支持和承认。但是，罗斯福一直没有回此信。新上任的驻华大使赫尔利从中作梗，而把中国未来命运的赌注押在蒋介石的身上。自1949年初开始，中共不断作出友好表示，表达了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并寻求美国对即将成立的新政权的承认，但先后受到美国的拒绝。1949年5月至7月间，中共官员黄华奉命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接触，双方话题“主要涉及中美关系”。

[8]6月,司徒雷登接到访问北平的邀请信,以便与中共领导人见面。但是,杜鲁门似乎过于担心来自国会的压力,担心国会指责他对中国软弱、对中国搞绥靖政策。6月24日,21名国会议员联名写信给总统,反对美国承认中国,并要求美国政府继续援助国民党。杜鲁门最后决定,在任何情况下,司徒雷登不得访问北平。1949年6月1日,据说周恩来通过一名澳大利亚记者给美国驻北京总领事一封信,表达了中国愿意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6月15日,毛泽东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同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9]杜鲁门政府又一次拒绝了这一倡议。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一边倒”讲话。杜鲁门则把这个讲话理解为中共领导人已经与苏联人密切联系在一起。尽管如此,由于美国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前途尚不完全清楚,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采取了等待观望态度,即“等待尘埃落定”政策。

新中国诞生后,美国再次面临着对新中国身份是否给予外交承认的问题。中国总理兼外长邀请美国和其它国家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是中国政府再次向华盛顿发出友好表示。10月2日,苏联承认新中国。美国则在犹豫。杜鲁门认为,美国不应该急于承认这个政权。在他看来,美国在1933年才承认苏联,那是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的第16年。美国国务院也宣布,美国在没有与国会和盟国商量之前不想承认新中国。美国显然选择采取不承认的政策,把新中国作为一种“其它者”加以区别。

结 语

从罗斯福到杜鲁门,美国对华先后采取了扶植国民党政权、扶蒋反共、等待尘埃落定、不承认新中国等政策。这些政策都涉及到认同政治。从历史上看,这些政策都失败了。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国社会和政治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认知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战后初期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以及美国政治中的意识形态作用,则限制了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作出明智的选择。

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选择,与其说是受物质结构压力的影响,还不如说是由于认同政治作用的结果。影响当时美国决策者对华政策考虑的东西,并不是中国的物质实力(那是一个经历了三座大山压迫、经历了无数战争磨难、千孔百疮的中国),而是战后国际体系中新中国所确立的政治范围或身份(一个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这一政治范围是与美国的战后政治身份(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相对立的。因此,当时的美国对华政策制订过程,乃是把美国(自

我)同中国(其它者)区别开来。“其它者”对“自我”构成威胁。在美国决策者看来,新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与其说是来自物质上的,还不如说是来自观念上的。

由于美国拒绝对新中国的身份给予外交承认,它造成中美之间无法形成积极的相互认同。这一结果是,两国之间没有产生它们在世界政治及地区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和观念,相反,它建构起两国间在彼此行动上的敌意和猜疑。1949年末和1950年上半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沃德事件、美国以武力保护台湾以及朝鲜战争爆发等……可以说明这一点。[10]倘若当初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作出正确选择,承认新中国政权,那么,战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历史也许就要被重新书写。然而,直到1979年,美国才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这时,新中国已经成立近30年了。

注释:

[1] Glenn Chafetz, Michael Spirtas and Benjamin Frankel (eds.): *The Origins of National Interests* (London: Frank Cass, 1999), p.viii.

[2]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24.

[3] Glenn Chafetz, Michael Spirtas and Benjamin Frankel (eds.): *The Origins of National Interests* (London: Frank Cass, 1999), p.viii.

[4] 参阅 Glenn Chafetz, Michael Spirtas and Benjamin Frankel(eds.): *The Origins of National Interests* (London: Frank Cass, 1999) 和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6] 1951年11月7日,杜鲁门给威尔·杜兰特的信,转引自 Robert J. Donovan: *Tumultuous Years: The Presidency of Harry Truman, 1949-1953* (New York: W.W. Norton, 1982), p.71.

[7] 参阅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8] 李宝俊:《当代中国外交概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3页。

[9] 《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91页。

[10] 关于这些事件的历史叙述,可参阅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和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收稿日期:2001年11月